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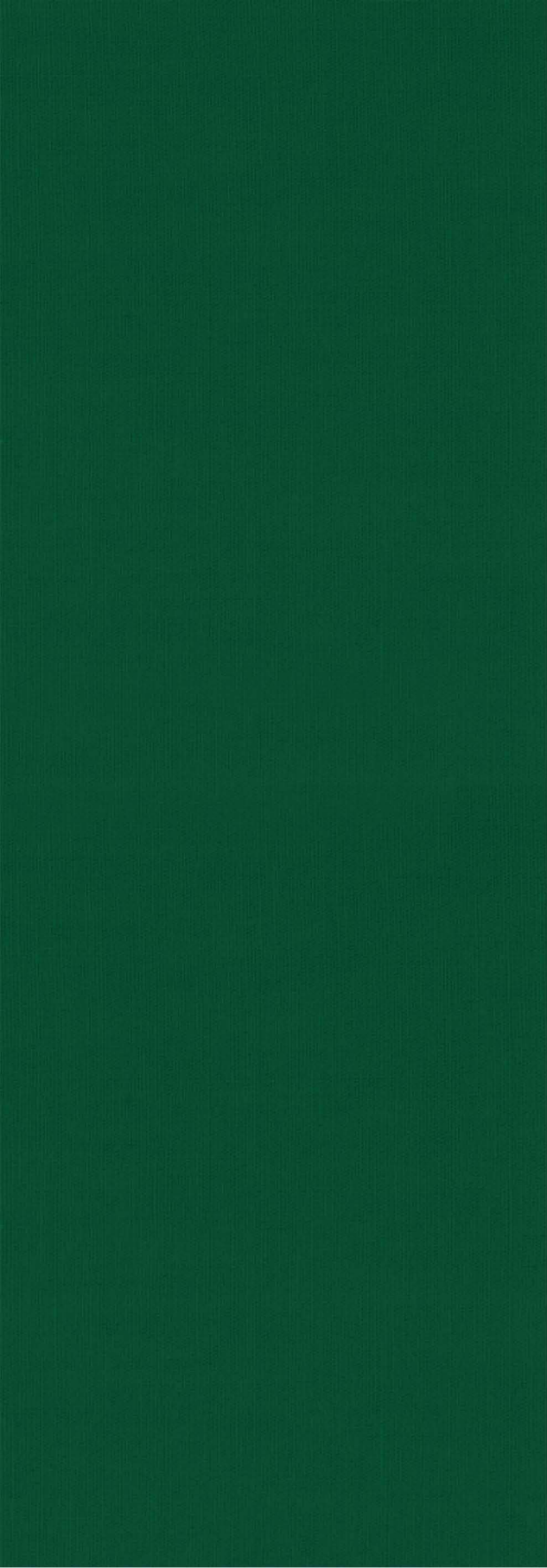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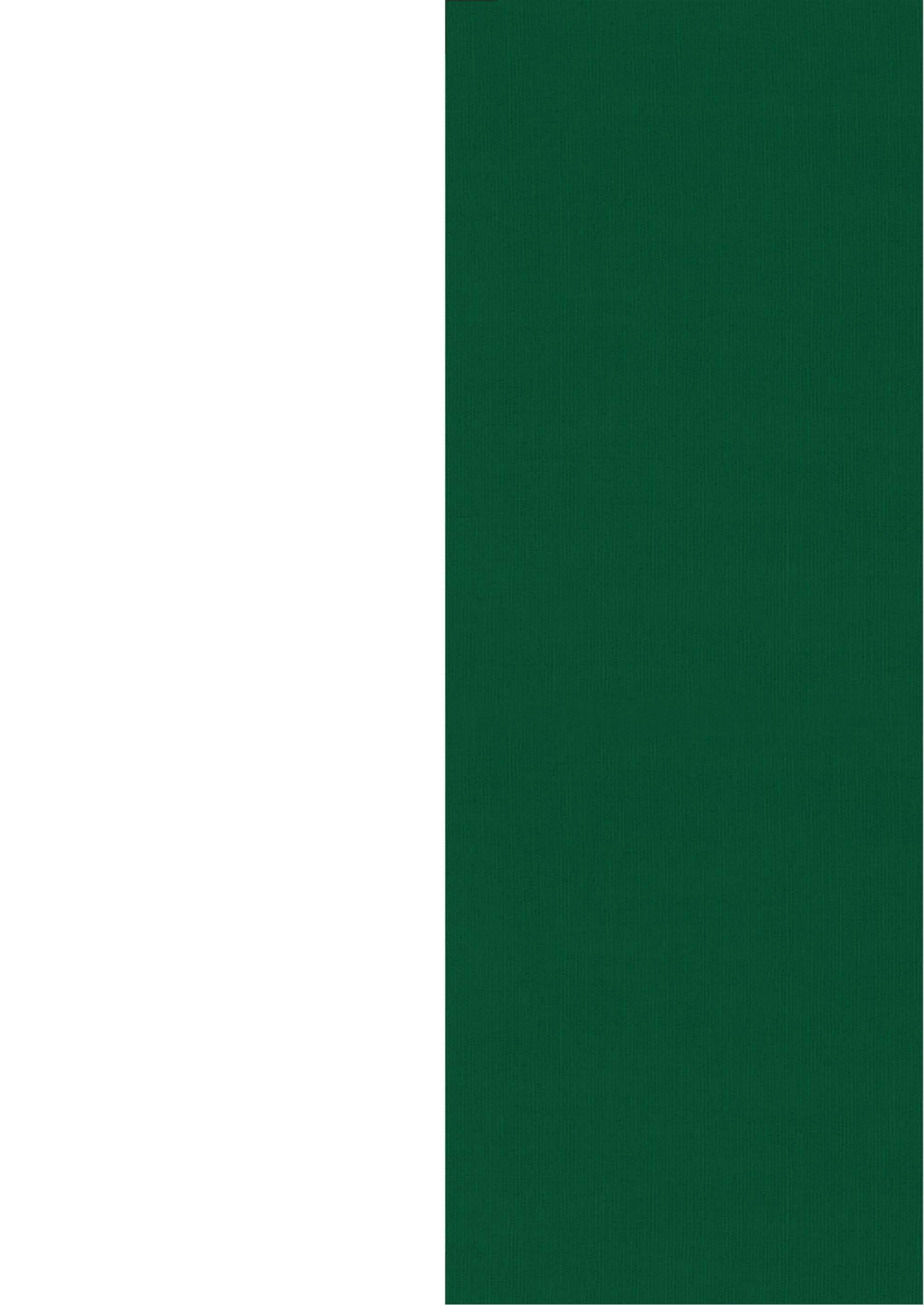
的田野作业与反思

孙信茹 杨星星 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的田野作业与反思

孙信茹 杨星 主编



ISBN 978-7-5482-3232-2



9 787548 232322 >

定价：58.00元

“我们”

的
田
野
作
业
与
反
思

孙信茹
杨星星
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田野作业与反思 / 孙信茹, 杨星星编著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482-3232-2

I. ①我… II. ①孙… ②杨… III. ①民族学—传播学—研究方法 IV. ①C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3771号

策划编辑: 赵红梅

责任编辑: 陶燕燕

王颖

封面设计: 郑明娟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28千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3232-2

定 价: 58.00元

社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7425573。

序 言

这是一本特别的书，这是“我们”的田野作业与反思。

“我们”很特别，这个“我们”是个有着诸多共同点的群体。这十个“我们”，都是来自云南或者在云南工作，也因此云南展开研究；这十个“我们”，尽管每个人研究的方向、具体内容差异较大，但却有着极为相近的学术旨趣，都是一群愿意一头扎进田野，在其中寻找社会事实和研究对象，并且将之视为乐趣的人。或许，我们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我们彼此之间也从未有过明确的集合或是商议，但较为接近的研究取向已经让这群人有了不可分割的关联。

这本书呈现的田野作业和反思，也很特别。对人类学和民族志有了解的人都会看出，这本书的书名取自经典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我们绝非要把该书和那本经典之作相提并论。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源于本书中呈现的所有研究，都是来自研究者亲临田野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和最直观的感悟，其中不少案例采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和书写方式。而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与以往研究论文集的汇编不同，因为本书的每个研究个案后面都有研究者真实的体验和对研究的感悟。如同拉比诺自己所言：“必须对田野作业进行反思，必须反思它的历史情境；必须反思它的体裁约束。”^①因此，对于拉比诺来说，他觉得他的研究是一个“想把这些话题摊开来以

^①（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的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页。

供讨论的谨慎尝试，也设想它是一个想把杂乱而纷扰的经验弄明白的努力”。^①我们在深入田野进行研究之后，也试图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概念、理论及方法的反思。在这点上，我们或许有着和拉比诺相同的追求与期待。

呈现在各位面前的这本“田野作业与反思”，研究者将目光聚焦于乡村、少数民族地区或是传统民族文化之中，力图从传播学和媒介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自觉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些方法，尤其是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传媒与民族、区域文化、民俗民间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关联展开分析。这样的研究思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新视角。就其研究特点来看，这些研究基本以个案的方式呈现出来：或是对研究对象娓娓道来，展开“深描”；或是追本溯源，以期展现研究问题的历史成因和特定的社会情境。其中，郑宇教授和曾静副教授最为特别，他俩不似其他人，都在传播学和媒介文化研究中浸润已久。他们一个是人类学博士，一个是文艺学博士，研究领域看似和其他人大相径庭。但他们的研究却通过对一个女性个体的人生经历书写，追问她的生存理性如何建立在由亲属关系、地缘关系基础上搭建起来的互惠流通网络的问题。这些命题，也是文化传播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问题。

具体来看每个研究者的个案与发现。

郭建斌教授长年一直坚持在云南独龙江地区（以下简称独乡）做田野调查，他也是国内较早的民族志传播开拓者之一。在对独乡当地人观看电视的活动进行观察和研究时，他试图阐释这种观看活动如何构成一个文化表演和再现的文本实践。本书收录的这篇论文是建立在他对独乡做了多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并回首对相关田野资料进行再度的阐释。他认为

^①（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的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页。

《在场》一文是为了弥补当年做博士论文的缺憾。这篇文章对于他来说，极为重要，自认为“也是我本人研究生涯中第一次独立理论表达的尝试”。论文展现了一个研究者对概念及理论谨慎和精到的使用，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自我反思。近些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滇川藏“大三角”地区，主要做的是和流动电影放映、观影相关的研究。而他认为，《在场》一文，把他这十多年两项不同的研究较为有效地衔接了起来，具有某种桥梁的意义。

孙信茹教授在这些年的研究中，较多地关注在复杂的社会网络运行和构成中，媒介力量如何与社会生活、经济运行、文化影响等逻辑一样，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她的田野调查着力于云南四个少数民族的乡村，本书收录的论文是关于这四个村落中的一个的。她在完成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和很多研究者一样，会遭遇枯燥和琐碎的田野工作。面对田野中涌现出来的各种事实和材料，如何通过“讲故事”让这些事实和材料变得有趣起来，这是很多人都会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收录的这个研究是一个如何将经验材料与理论问题关联起来的范例。对于田野观察者来说，最难的可能是，如何在搜集到的事实材料与恰当的理论或概念之间建立有效、合理的关联。她进入傣族村民生活情境和文化逻辑之中，将“记忆”的概念和理论引入，对村民展开深度访谈和观察，从而将他们的家庭照片故事一一呈现。

杨星星副教授的研究从进入田野最初，就产生了较为明确的研究问题：为何一个基本遵循专业化运作的基层新闻机构在实际运作中会出现如此多的特殊表现？这些“另类”表现背后的牵引力量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一“微观实践”的过程对于区域社会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和意义？作为中国电视业的“神经末梢”，基层电视台的存在价值与话语空间在哪里？这是一个以明确的研究问题作为导向展开的研究。一个

好的研究，往往是从激发起好奇心开始的。如他所言：新现象中不一定蕴含着新问题，而老现象中也未必全是老问题，无论是新现象还是老现象，都要善于从中发现新问题，这才能形成具有研究价值的研究命题。从这个层面讲，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一项好的研究都是特殊性阐释和发掘启示性意义完美结合的过程。

陈静静副教授和她的研究团队关注的是流动电影放映。她们试图分析，在多元化的媒介图景及其允诺的消费者主权下，这种国家主导下的流动电影放映，其话语及实践获得了藏族受众怎样的回应？在细致和层层剖析的研究过程中，她们提出了一个颇有意义和价值的分析：在商业力量 and 个体化双重影响下，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国家权力代理人角色的放映员，如何通过他们的战术，展开和权力的协商。

陆双梅副教授的叙述和视角极有个性，她通过解剖自己的研究历程和真实的“心路”，用情感来体验研究对象的生活。她试图去建构自己心目中的读者，希望这个读者会被她生动有趣的故事打动。所以，她觉得自己的研究是一个向读者讲述有情感的田野调查和思考的过程。在她的反思中，她试图回答人类学家究竟是“作者”还是“写作者”？民族志呈现的究竟是“他者”在“那里”的生活，还是也带着“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的印记？

肖青副教授通过两年多扎实的田野调查，关注了一个村寨的起源，为何在同一个村寨会形成不同的传说？这些传说得以产生和流传的历史原因是什么？不同版本的村寨起源传说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逻辑关联？在乡村社会的历史场景中，民间口头叙事究竟具有怎样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她细腻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任何村寨文化因子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它总是与具体的传承主体、活动过程、时空场域、生活情境、场景氛围、情感体验、文化互动等诸多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民间口头叙事就是一个群体

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所建构的一种历史记忆与历史表述。它是群体对所记忆的历史事实的理解和阐释，是为强化群体认同和巩固群体凝聚而进行的策略性表达。

罗梅副教授探讨的是怒江傈僳族民歌这种民俗艺术的现代生存问题。她具体从历史建构、社会维护、个人创造和体验等几个角度来思考怒江傈僳族民歌的传承。她的研究颇有新意和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该个案体现出了较强的跨学科研究色彩。更重要的是，在对传统民歌与音乐文本的考察与分析中，她提出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研究者似乎是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姿态出现在研究过程中：冷静、客观、清晰。但研究者真的接近了“他们”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李刚存老师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乡村建设展开对话。他在研究中认为，村民的言说及话语权，对乡村建设来说至关重要。他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言说，必然涉及相关的媒介和技术，涉及媒介技术的知识与观念。除民族志和行动研究的取向外，媒介哲学或技术哲学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他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只有不同的方法和路径之间的相互启发、检视、借用和交流，才能真正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形成乡村建设的推动力。

马小娟老师的聚焦点也较为清晰和具体，她分析了云南民歌的传播兴衰中究竟有什么主要因素在起作用？在这种文艺传播的过程中，民族歌曲是否证实与发挥了阿尔都塞所称的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文化征用”是一种国家治理手段，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的一种惯常方式。

郑宇教授和曾静副教授则提供了一个跨境流动的个案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位极为特殊的女性——熊从琴。她的多重身份与波折人生经历，已经具备了人类学田野个案研究所必备的，一种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与多方面的代表性结合的二重性特点。他们两个人的研究视角非常独特，

而且他们在方法论方面的探索也值得我们借鉴。他们提出了个人深度访谈的困难与追踪调查的方法论思考。当代人类学非常强调问题意识，或者说理论预设。有了问题意识，才能明了田野调查的重点和线索；也只有有了问题意识，零散的个案资料才会产生研究主题，并焕发理论思辨的神采。通过对熊从琴人生经历的解析，他们认为可以将其纳入一种“生存理性”的理论框架中来进行分析。

十个案例，研究对象各异，表述文本各具特色，展开的研究层面和丰富意涵也各不相同。在我看来，在每个个案之后，作者提供的“思考”最有看头，因为本书的所有作者在此“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观点。通过公开解构、分析、审视我们的田野工作经验，我们能够帮助公众加深对我们方法论的理解。通过吸引人们注意参与观察所要求于我们的特定技巧，给我们带来的个人考验，我们才能展示其复杂精细和勃勃生机”。^① 其实，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和追求。

我们将继续努力，同时我们也期望有更多的“我们”能够加盟进来，一同对话，携手前行。

孙信茹

2017年9月

^① （澳）林恩·休谟、（澳）简·穆拉克编著：《人类学家在田野》，龙菲、徐大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目 录

序 言 / 1

一 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

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

——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 / 1

思考：《在场》一文的“前世今生” / 27

二 家庭照片：作为文化建构的记忆

家庭照片：作为文化建构的记忆

——大等喊傣族村寨的媒介人类学解读 / 30

思考：“家庭照片”和别样的“记忆”研究 / 50

三 权力的“微观实践”与话语想象

权力的“微观实践”与话语想象

——对某少数民族自治县电视台的考察 / 58

思考：一个研究案例的经验性表述与思考 / 73

四 赋权，还是去权？

赋权，还是去权？

——一个藏族村庄中的传播、权力与社会身份 / 81

思考：“嵌入”（embeddedness）与“赋权”（empowerment）

——一个藏族村庄的质化考察 / 114

五 手机社会网：藏民手机交往行为和特质分析

手机社会网：藏民手机交往行为和特质分析

——基于迪庆藏族村落的田野调查 / 125

思考：藏区手机社会网研究的缘起、经过和反思 / 138

六 民间口头叙事之争与村寨历史记忆建构

口头叙事与村名之争：一个村寨历史记忆的建构

——以云南石林彝族撒尼村寨月湖村为例 / 149

思考：民间叙事·历史记忆·生活情境 / 169

七 技术与传统

技术与传统：全球化语境中怒江傈僳族民歌传承的变化 / 176

思考：《技术与传统》一文的缘起与形成 / 194

八 哈尼族村落的微博实验

智能手机与微博传播

——一个哈尼族村落的微博实验 / 201

思考：媒介行动与乡村可能

——微博实验的再思考 / 214

九 歌唱的边疆意象与民间文化征用

传播视角：试论歌唱的边疆意象与民间文化征用 / 221

思考：《传播视角：试论歌唱的边疆意象与民间文化征用》的再思考 / 231

十 社会变迁与生存理性

社会变迁与生存理性：一位苗族妇女的个人生活史 / 238

思考：微观的对象，宏观的视野 / 257



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

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

——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

作者简介：

郭建斌，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志传播、媒介人类学。

原文信息：

发表于《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

引言：再阐释的必要

独乡地处滇、藏和缅甸联邦（The Union of Myanmar）交界处，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一个乡——独龙江乡（简称“独乡”）。1994年8月和1999年9月，我曾两次在独乡进行过短期调查；2001年10月—2002年4月，我在独乡进行了近半年的田野调查；2004年6月，我又对独乡做了短期回访。对于独乡较为详细的区位、历史等方面情况，我

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做过详细介绍。^①

在上述几次田野工作的基础上,我曾对大众传媒在这样一个小区社会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做过较为系统的阐释。^②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理论指向不够明确、具体,很多方面只是点到,并未做深入阐释。此后,我对电视与当地人日常生活进行过描述。^③在另一篇文章中,我借鉴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概念对经由电视所实践着的一种权力形态进行过阐释。^④此外,从方法论的角度,我也试图对在第一次系统阐释中提出的“权力的媒介网络”概念作进一步发展。^⑤

在这些阐释中,即当地人的电视观看活动如何构成一个文化表演和再演的文本实践,始终因为未找到合适的理论切入点而被悬置。到底如何来深化这方面的阐释?近年来对相关理论文献的阅读、思考和梳理,激发了我产生一些想法。以这些想法为理论资源,回首相关的田野资料,愈发觉得有再阐释它们的必要,目的是将日常生活中的电视收看活动,看作发生于地方文化和国家权力交织而成的场景中的一种仪式表演。这个思路,可以拓展传统受众(观众)研究(audience analysis)的理论涵盖。

① 参见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郭建斌《电视、象征资本及其在一个特定小区中的实践形态——独乡个案之田野研究》,载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② 参见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小区——独龙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

③ 参见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参见郭建斌《电视、象征资本及其在一个特定小区中的实践形态——独乡个案之田野研究》,载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⑤ 参见郭建斌《权力的媒介网络:一个传播社会学的概念——兼论传媒与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传播论坛,广西南宁,2005年6月26日。

一、研究问题及其由来

（一）对经验材料的反思

（晚上）8点多钟，中央一台开始播放电视剧《大法官》，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开始下起小雨。没有带雨具的人躲在三四米外的村委会房子的房檐下看电视，有两个人拉了一条塑料薄膜顶在头上仍然坐在原来占到的最佳位置上，有一人打着雨伞蹲在两人旁边偏着头看。8：30分左右，看电视的人有30人，小孩占了一半多一点。放完《大法官》，电视又被转到播放着电视剧的云南台。我坐在火塘边写日志，耳朵听着外面电视场上的动静。当电视剧插播广告时，有几条广告词才说出一半，中间稍有停顿，小朋友们便响亮而流利地补上后半句，看得出他们对这些广告词非常熟悉，那情形，就像课堂上老师问出一个大家都能回答的问题时，学生们齐声的回答。

这是我的田野日记（2001年10月30日）中对村民在独乡龙村村委会院子里冒雨观看露天电视的一段记录。类似的场景，在独乡调查期间多次遇到。在近年来对田野调查资料整理过程中，我始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些观看场景、片断（或碎片式的记录和记忆）究竟如何解释？电视里所播放的大多数内容远离他们的生活，但他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这又说明什么？这样一个观看场景里的不同的人，又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参与到这样一个具有某种仪式意味的观看活动中？

此外，田野之外的一次经历也成了我经验反思的一项内容。2001年我去独乡调查之前，找了几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希望得到一点经济上的资助，以提供报道或受众调查资料作为交换条件。但是朋友还是婉言拒绝了我，理由主要有几个方面：（1）独乡地方太小，人口又少，那里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一个省级电视台的电视观众感兴趣的；（2）独乡电视观众在一个省级电